

# 六十年的变迁（中）

## 第七章 海外归来

### 一 踏进国门头两天

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季交恕从日本东京回国了。同他一路回国的有汤谟和陈霖。前一位是在东京明治大学学法律的，平江人，家里很有钱，爱漂亮，又会吹牛皮，拉拢人，外号“小白脸”，又叫“小滑头”。后一位是在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纺织的，长沙人，为人不讲究吃穿，不爱说话。自一贯教书的父亲死后，只剩下一个母亲住在舅家，他便省吃俭用，经常从官费中寄一点钱与她零用。在日本留学界中，他要算是最穷苦也最用功的一个。因为彼此都是相交好几年的朋友，又都同时毕了业，好比科举时代中秀才，少年时代做新郎，感到非常愉快。加上天朗气清，坐在火车上，说说笑笑，不知不觉的一下就到了长崎。

可是从长崎开船，漫天云雾，看不到一点太阳。呜——呼——，狼嗥虎啸般的风声；啪——砰——，排山倒海似的浪声，惊天动地的互相交响着。这条十几丈长的大阪丸，被冲击得前颠后簸，左倾右摇。整个船舱里的旅客们，都静悄悄地卧着不动，也不说话，只听到一片啊啊啊的呕吐之音。季交恕心脏还好，没有呕吐，却也多少有点头晕，不像在火车上那样爽快。而且一想到回国以后，不知怎么办，觉得自己也像这汪洋大海中的孤舟。

船已渡过黄海，驶进吴淞，风平浪静了。他们这三位，才又开始活动起来。将行李收拾之后，走上甲板一望，首先看到的远景，像是一个炮台。

“那是不是把守国境的吴淞炮台？”汤谟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指头，侧望着他们两位这么问。

“是的。”陈霖答复两个字。

“把守什么国境！敞开了的大门，谁也可以闯进闯出。唉！”季交恕长叹一声，额角上现出几道皱纹。

船进吴淞口以后，行驶比较慢。太阳已经西斜，还没有到达上海。他们三位，仍然在甲板上肩并肩地踱来踱去。

“你们打算住哪里？”陈霖问。

“我打算住美租界远东饭店。”汤谟望着陈霖，又望望季交恕。“一起住好吗？那里很漂亮。”昂着头，显现出一种得意的神色。

“不！”陈霖摇头：“几块钱一天的房租，住不起。我打算住恒丰纱厂聂润达家里，他是我的同乡。”

“汤谟不像我们，几千担租，有什么住不起！”季交恕说：“我是打算到法租界余寿松那里去。”

“那也好。日本电报通讯社的差事不错咧，余寿松前两年才毕业，听说一个月就赚得两百多块钱，另外译书的稿费也不少，日子蛮不错。”这是汤谟的话。

“是不是帝国大学的余寿松？”陈霖问。

“你认识他？”季交恕说。

“认识，他也是你们平江人，学经济的嘛，怎么改行了？”还是陈霖的声音：“我是要搞本行纺织，你们呢？”

“我打算到北京去应留学生考试，弄个把审判厅长做一做，至少搞个推事<sup>①</sup>。你呢？”汤谟扭转头问季交恕：“去不去应文官考

---

<sup>①</sup> 推事，审判案件的法官，即审判员。

试？”

“我呀，哼！”季交恕仰着脸冷笑一下：“没有背景，应什么考试？”

“那不一定。陈效文有什么背景，从日本回来就考上交通部的‘签事’，每月几百块。听说还搭股做生意，积了十几万家私，在北京买了很多房子，比余寿松强得多。”汤谟说这话的意思，做官比搞新闻事业好。

“陈效文有交通系的关系。”季交恕带着一种揶揄的神气，望着汤谟道：“难道我们留学就只为升官发财吗？现在是北洋军阀当权，你愿意在他们胯下讨饭吃？哼！我是要等回国以后看清楚情形再说。”

大阪丸渐渐驶近上海，老远就可以望到许多塔一般高耸在天空的烟囱，喷出一股一股的黑烟，连成一大片，好像凝聚在半空中的云朵，正在徐徐上升。陈霖站在船头甲板上，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远远地望一下，喊道：“你们看！好多工厂。”一边将望远镜递给季交恕，一边说：“前两年，我请假回国时候，那里正在建厂房。这都是乘世界大战英美日无暇东顾机会搞起来的。新建好多火柴厂、面粉厂等轻工业，大多数是江浙工商业家的啦。”陈霖面带笑容。“看样子，我们中国振兴工业有希望。据说上海的中国纱厂锭子，在大战开始那年，还只十六万九千多锭。这四五年增加到二十一万六千多锭哩！”

季交恕接过望远镜，突然，一阵狂风吹来，他侧侧身子，扶着栏杆，瞧了一瞧。那云朵似的黑烟，好像经不起这狂风的袭击，一下子被吹得四散。仿佛是这些工业，不会长此兴旺的征兆。

大阪丸靠上了上海码头。他们这三位，一同跑下舱去，分头爬坡了。这时，天还没有黑，上海客栈里来此接客的人们，黑压压的一大群，各自拿着一迭白纸红字印有旅馆招牌的名片，挤在船舱里，大嚷而特嚷：“长安旅馆！”“大东！”“亚洲！”“……。”

季交恕携着行李，站在船舷上，正想开口喊挑夫，可是一下想起：十年前，同凌翥翔初次到汉口起坡时，被挑夫头勒索过四块钱，还挨他一顿骂；八年前，由上海到广州起坡时，被小偷扒去一个皮包。听说上海是扒手最多的口岸，我虽然在这里来往过几次，但待的时间不久，情形生疏，会不会又出岔子呢？正在这样担心着。

“大东！大东！你先生住哪里？”一个穿薄绸夹长袍的高个子，拿着旅馆名片，朝着季交恕笑眯眯地走过来，一面说：“这是你的行李吗？”一面喊人：“来！来！搬行李。”

“噯！不要搬！我不住旅馆。”季交恕连忙摇手。

“住哪里？”

“住朋友家里。”

“朋友在哪里？”

“法租界霞飞路。”

“哦！远哪！我帮你叫马车。”那个接客的高个子，表示十分殷勤。

当下，季交恕想了一下：现已是上灯时分了，不晓得法租界霞飞路的尚贤坊还有多远？将行李交给他，至多不过花块把钱小账，免得自找挑夫，自雇车子，少去许多麻烦，于是伸出手接着那张名片问道：

“你贵姓？”

“我姓王。”

“好吧，就请你叫马车。”紧张的心头，一下轻松了。因为他知道，也仅仅知道这一点规矩：经过客栈里接客的，行李就保险不丢掉。

蹄声，一匹又高又大，但是屁股上凸出两块大骨头的瘦黄马，慢慢儿拖着四位客人，从江边走上租界的马路上。那个接客的，也坐在这辆车上。一会儿，马车停下来了。抬头一看，红绿电光闪烁映出四个大字：“大东旅馆”。他们的行李，都一起被搬了进去。

“四位。”那个接客的高个子，走进大东旅馆的大门，向账房这么报告一声。

“我不住这儿，住朋友家里。向王先生说清楚了。”季交恕这么说，同时就喊：“王先生！”回头一望，接客的王先生，不理睬似的一溜烟走开了。

“那不行。上海规矩，哪家接的客就住哪家。我们的房子分几等，都很便宜，好歹由你住。”从账房内走出来另一位，装腔作势地说：“你先生从哪儿来的？”

“从日本来的。”

“哦！这是中国啦！不行，不行。”

互相争吵一阵。季交恕生气了，马上跑出去，找来一个中国巡捕，得到他这样的调解：由季交恕出头等房钱一天四块，马车接送费三块，上下挑夫搬行李两块，接客的小账两块，合共就是十一块。

季交恕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也只好乖乖地付钱。坐上刚才坐过的那一辆马车想道：“天天盼望毕业回国，以为在自己国内总比在外国好，咳！成个什么国家！”不多久，到达了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坊十五号。

阔别两三年的朋友，一见面，自然不胜欢喜。季交恕洗过脸，叙过寒暄，就把大东旅馆这回事告诉余寿松：“我又当了一回土包子。上海地方的社会风气，怎么坏到这样呀？真欺负人！”

余寿松微笑：“这不算稀罕，上海租界，吃人的花样多得很。我在这两三年，还是半土包子呢。”

“我以前虽然到过上海几次——”季交恕屈指数一下：“三次。每次都只住过一两天。这一回，打算在你这里住个把月，多看看这二百多万人口的亚洲第一大城市。行吗？”季交恕和余寿松，在东京合住过“贷家”<sup>①</sup>，关系也很好，可是余寿松是一向独善其身，小

---

<sup>①</sup> “贷家”，日语，租赁整幢房屋叫“贷家”，租赁一二间房子叫“贷间”。

心谨慎，爱打算盘的人，所以最后又说出这么一句像是真又像是开玩笑的话：“你心里疼不疼？”

“欢迎！欢迎！”余寿松一笑，站起来，拍拍季交恕的肩膀。“老朋友嘛！”伸出手，指着房子：“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厅，我们两口子住楼上。还有一个比较宽的亭子间，你就住那儿，不成问题。”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二百四十块。”

“听说还有译书的稿费，译些什么书？”

“有一些。”余寿松像是很高兴的样子，马上就起身上楼，拿出一本书和一迭稿子递给季交恕道：“你看！这是最近从东京买来的时髦书，我已开始翻译。”

季交恕接着那本书一看，乃是日译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道：“哦！据我们的教授加藤义太郎说：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呢。”轻轻地摆一下头，接着说：“近两年的日本不同啦！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什么共产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书，多得很。许多大学，常有‘苏俄’<sup>①</sup>、‘劳农政府’等校外讲座。”

“这两年，中国也变啦。”余寿松也把这几年中国的情况告诉季交恕道：“有些书报刊物，也是介绍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少青年谈起主义来了。噫！你说共产主义好不好？”

“好是好，不过——”季交恕踌躇一下，心上心下似的踱几步：“据加藤义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最好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也有些人反对，说劳农政府搞得不好，会垮台。到底谁对谁不对，很难说。”一知半解的神气，摇摇头。

---

①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成立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简称苏俄。一九二二年冬，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起来，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但我国一直到大革命时期，习惯上仍往往称它为苏俄。

“对，我也觉得这不过是理想，很难兑现。”余寿松点一下头。望望搁在这客厅旁边季交恕的一口皮箱、一个被包、一只网篮问道：“听说你买了很多书，带回来没有？”

“还有几口书箱，都交了转运店，这里边只带了十几本书。”季交恕指着那口皮箱，立即把它打开来，拿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余寿松：“这一本是最近出版的。”

余寿松伸手接过来一看，是日译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边翻目录边问：“只带回这一卷哪？”

“就只这一卷。第二、三卷听说还在翻译，不久会出版。嘿！它是从商品、货币讲起的。”季交恕走近前去，翻开那本书，说了几句模模糊糊的夹生话：“过去我们所学的什么生产、消费、交易、分配那一套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恐怕有些不大对？”指指自己的肚子：“饿了，快开晚饭吗？”

余寿松立即放下那本书，站起来喊：“阿升，开饭来。”

过了一会儿，当差阿升手里拿着一瓶酒走进来喊：“请吃饭。”桌上，摆着六只碗，一半是季交恕几年来没有尝过的家乡菜：腊肉、腊鱼、干萝卜丝。

“家乡菜真好吃，难怪晋朝张翰，一想到他家乡的莼菜、鲈鱼，就弃官不做回家去。”季交恕边吃边开玩笑似的说：“现在中国一团糟，没有出路。我也想回平江吃薯丝饭去，为地方做点事，你说好不好？”余寿松像赞成又像不赞成的样子道：

“好是好，可是平江地方太小了。‘处处有路通长安’，何必回平江？”

“路是有，就是找不到光明之路。所以，我不同意汤谟的意见到北京去应考，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吃过饭，彼此就起身，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余寿松一手端着茶，一手摸着下巴，像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才又张开嘴巴：

“喂！你愿不愿意搞新闻教育事情？现在《申报》副刊、商务印

书馆都在找编辑,我有熟朋友在那里。你如果愿意当编译这类的话,我可以帮忙。”

“好是好,恐怕干不了。老实说,与我的志愿也不相符。”

“怎么不相符?你还没有过足革命瘾啦?”余寿松因为在东京同他住的时候,曾经听过季交恕对辛亥革命有遗憾,还想革命的话,所以他这么说:“朋友!现在不像十七八世纪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啦!我们中国能革出个什么名堂?”他有气无力,没精打采,慢慢的接着说一大串:“你看!从袁世凯做皇帝,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虽因全国反对,发生‘护国’战争<sup>①</sup>,取消了帝制。可是袁世凯一死,接着就是段祺瑞当权,南北分裂,又来一次‘护法’战争<sup>②</sup>。护来护去的结果,还不是北方的皖、直、奉三系军阀,连年混战,南方的桂、滇、黔等小军阀,暗斗明争,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中国政治真糟啦!老实说,我是不打算进政界的,就这样干一辈子打算了。”

“是的,我也不打算进政界,太脏。不过,我们的国家,越搞越糟,国际地位越来越低,假如不是聋子、瞎子、没心肝,怎能够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呢?”季交恕这么回复他。随即将前两年,中国留学生代表,为反对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sup>③</sup>,在东京锦辉馆开会的往事,告诉余寿松。“当我们开会时,一大群日本警察冲进来,勒令散会,而且横蛮无理,大骂:‘马鹿!’‘清国奴!’<sup>④</sup>我因据理力争不散,他们就拳打脚踢,衣服全被撕破。可是,我也不客气,回赏他们几个耳光。妈的!”他把夹在手指里的一支烟,猛吸一口,往沙发

---

① “护国”战争是民国四至五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战争。

② “护法”战争是民国六至七年拥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时代所谓“新约法”的战争。

③ 二十一条内容分五号,前四号除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力移让与日本外,还要求日本得在满、蒙、鄂、赣、粤各地有土地租借、铁路建筑、矿山开采、工商经营,甚至在全国有政治、财政、警察、军事等大权。袁世凯除第五号外,都接受了。

④ “马鹿”,日语,骂人的话。“清国奴”即亡国奴的意思。

上倒下去。“呼——”仰脸朝天,重重地吐出一股白烟。

“唉!”余寿松慨叹一声。“国家不独立,怎么抬得起头来!”

“哼!抬头!从反对二十一条以后,不论招租贷间或贷家,公然写不租中国人,欺负到这步田地,叫你怎么忍得下去?”季交怨越说越气愤。

“哦!难怪你生气。”余寿松皱着眉头说。“可是气有什么用啦!还是自己打扫门前雪算了,免得受危险吃亏!”

季交怨因见余寿松话不投机,有些不高兴。但又觉得,他虽然消极悲观,并不是反对革命的人。于是说:“寿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你我就没有责任吗?都像你这样,那中国四万万,就等于四万万行尸走肉啦。”

“这也对。”余寿松说着,脸上有点红。

## 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

今天是礼拜,季交怨因见上海是最重衣衫不重人的地方,而自己身上穿的,还是一身半新半旧的日本学生服,故邀同余寿松在街上买了几件中国绸长衣。换过装后,同去远东饭店。这是美租界一家最漂亮的旅馆,七八层洋楼,好几道电梯。乘电梯上去一拐弯,是第五层楼的公共客厅,汤谟就住在这客厅旁边的五三五号房间。

“哦!你们来了。”汤谟从客厅里慌慌张张走出来打招呼:“我房里去坐。”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油头粉面,鲜红嘴唇,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女郎,穿着花绸旗袍,高跟鞋,正在吃吃地笑道:

“你呀!不正经。”

他们二位,跟着汤谟一同走进五三五号房间里,互道几句寒暄,季交怨就问:

“客厅里那位女的是谁？很漂亮的样子。”

“就住在隔壁房间，姓赵的姨太太，这两天才认识的。”汤谟满脸是笑容：“她对我很有意思，嘻嘻！”

“嘿，你这个人哪！”季交恕指着汤谟边笑边说：“在东京包女学生，到上海两三天，就吊赵姨太的膀子，真是猫儿少不了荤。我就要写封信到东京去告诉青木芳子。”扭转头：“寿松！青木芳子还只十八岁，又聪明，又漂亮，可惜家里太穷，靠秘密卖淫读书，他对他的感情可好哩！”指着汤谟：“你这个家伙，一过海就把她忘记了。薄情郎！真要不得。”

“唔！在日本只要不是有夫之妇，男女关系无所谓。上海不同啦，千奇百怪的花样多得很。这两天才认识的，她就对你有意思，莫非是‘仙人跳’！”余寿松半开玩笑半警告似的。“要小心啦！乱来不得。”可是汤谟和季交恕，从来没有听说过“仙人跳”这个新名词，同声问：

“什么‘仙人跳’？”

“上海的‘仙人跳’多得很，要小心啦——”余寿松刚刚开始说几句什么是仙人跳；而这三五五号房门上，卜、卜、卜连响几下，像是有人敲门。

“谁呀？请进来！”汤谟刚刚站起来答应一句，陈霖把门推开进来了，一手拉着余寿松：

“呀！两三年不见，你胖了啦！”因而就把余寿松的话打断了。四个人面对面坐下，东扯西拉，谈了一阵别的事情。

“请你们上馆子去吃东西！再到大舞台去看看新戏。”余寿松表示要做东道主。

“不必客气吧！”陈霖是半推半就的口气；悬起左臂看一下手表。“十二点半，还早。”

“我才吃早饭不久，肚子不饿，谢谢你。晚上看戏，我做东。”汤谟边说边望着对面衣柜上的镜子；长尖尖的瓜子脸，光油油的西洋

头，玄青色的西装，亮闪闪的黄皮鞋。他心想：比赵姨太虽然稍有逊色，但也不会相差太远。于是站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表面似乎镇静，心里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正惦念着隔壁房子里的赵姨太，而这三个客人，却仍然罗罗嗦嗦地纠缠着。

“听说你要晋京去应留学生考试？”余寿松朝着汤谟这么问。

“唔！”

“哼！有什么好考？没有靠，就难考上啦。你看老常，那么好的学问，还不是‘名落孙山’考掉了。”余寿松又扭转脖子望陈霖：“听说你想在上海搞纺织业？中国工业太落后，你搞这行很好。”

“想是这么想，成不成功，还是问题。”

“那有什么不成功。上海是纺织业中心，聂润达又是你的同乡。”

“这两天我打听了一下，在恒丰纱厂的几个留学生，都是英、美派。”陈霖摆摆手。“很难插进去。听说日本人办的内外棉六厂，欢迎日本留学生，我又不愿意去。”

“为什么？”沉默半晌的汤谟，突然这么插一句，表示他对他们的谈话并不是完全不关心。陈霖答道：

“还是搞中国自己的工业好些。”

“日本在中国办工厂，用的是中国人，出的货在中国卖，还不就等于中国的工业！”汤谟的观点不同些。

“你这个人！那根本不同啦！怎么能够划等号？”季交恕立刻虎起一张脸皮。“这就是外国资本家输出资本的办法。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就地收买原料，制成商品，垄断中国市场，既不要远涉重洋，减少了运输费；又不要出入口报关，免掉了入口税。所以英、美、日等国，都在上海这些地方办工厂，赚大钱，难道是替中国发展工业吗？”

“哦！难怪，你是学经济的。”汤谟也放下了脸皮。“我们学法

律的，不会吹这套法螺<sup>①</sup>。”

因为皖、奉二系的后台老板是日本，直系的后台老板是英、美。现在是皖系段祺瑞当权，日本得势。所以余寿松对这个素有亲日思想，同时又崇拜英、美的汤谟，不便当面批评，但又怕他们三位吵嘴，马上站起来岔开：“好！好！不谈了。同去吃东西。”一手拉着汤谟：“走，走，走。”

走出远东饭店的大门，余寿松立即跑向前去叫马车，大家坐上去，一直拖到英租界四马路一家不大不小的湖南馆子“潇湘馆”门口才下车。此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而这个馆子的许多小房间，差不多都被那些吃午饭的客人占满了。据说这个“十里洋场”，是白天当夜晚，夜晚当白天，不论什么生意，要到下午才开始兴旺，夜晚就顶热闹。这与内地各城市的习惯大不同。

潇湘饭馆是两层洋楼，他们四位，走进第二层楼东边的一个小房间坐下来，东西两面，全是亮晶晶的玻璃窗。从南窗看去，对面一幢半中半西式的两层楼的店铺内，一些红男绿女和穿破衣烂衫，提着小篾篮叫卖香烟果饼的人们，在那里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像是这四马路生意最好的一家。季交恕好奇心动，站在南窗门口，伸出半个头，朝它望了一望：店门前，挂着一块长方形的横招牌，上面写着贴了金的三个大字：“青莲阁”。大厅内，星罗棋布地摆满了茶桌，坐满了人。“哦！大概是个茶馆！”他这么想着。可是又看到很多油头粉面的女人，三三两两的一伙又一伙，围着那些茶桌团团转。有的张开嘴巴，向客人说说笑笑；有的伸出手去，调调捏捏。“也许是个妓馆？”他又这么猜着，回转身子问余寿松：

“寿松！对门的青莲阁好热闹，做什么生意的？”

这时，酒菜还没有端来，余寿松正和汤谟、陈霖坐在桌子旁，边吃瓜子边谈天。他站起来，走至窗门口，望望青莲阁，又走回来，

---

<sup>①</sup> 法螺，日语，吹牛皮的意思。

说：

“这是四马路最有名的茶馆。”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里说说笑笑，调调捏捏？”

“打野鸡。”

“哦！那就叫打野鸡呀，早听说过，就是没有见过。”季交恕记起早年在汉口时，胡翠喜同他讲过上海的三等娼妓，有所谓“野鸡”的话；眉毛一皱：“这成何体统！”

“嘿！四马路大马路的野鸡，比东京浅草的妓女还多还坏，一到晚上，就公然成群结队在街上拉客。”余寿松瞪起眼睛。“租界上的这些娱乐税收不少啦！哼，还不是洋大人发财。”

“为什么要拉客？”

“接不到客，班子里的龟婆就会打她，不给她饭吃。所以她们就非拉不行。……”余寿松把野鸡班子里的情形说了一些。

“咳！人生有幸有不幸，这样的鬼世界，妇女更倒霉。”季交恕不断的又叹气又摇头。

“中国街上有没有野鸡？”季交恕接着又问。

“只有娼妓。公开拉客的野鸡是租界内的特产。”余寿松答道：“这几年，上海租界的坏事，越来越多了，比中国街更坏。”

“那不见得吧？中国街的房子那么坏，那么脏，何能比得上租界内的洋房马路这么漂亮文明啦——”汤谟刚刚说到这，南窗外突然轰起一阵人声，夹杂着一些粗野的咒骂：“妈的，你知道老子是谁？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呀！”“爷叔今天脾气好哩，要不，哼！老早就见阎王。”“没长眼睛啦！爷叔的蛋糕都敢偷？”还有啾啾啾啾的，像是女孩子的哭声。

季交恕他们，跑到窗口往外一看：青莲阁门口，围着一大堆人，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内瞧。几条大汉，正在那里指手画脚地骂。一个骨瘦如柴，约莫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补钉衣服，蓬头散发，在那里哭。她旁边丢着个篾篮，十来盒香烟，横七竖

八地撒在地上。这时，潇湘馆的茶房，把门帘一卷，送菜来了。

“那是怎么回事？”季交恕用手指着青莲阁，问这茶房。

茶房眨一下眼，颇有犹豫之色，嗫嗫嚅嚅地说：“咳，先生，打人，小事啦！”

“为什么打人？”季交恕见他不敢直说的样子，道：“你尽管说罗！”

茶房打量他不像是歹人，才壮着胆子说：

“那个女孩子是卖香烟的。家里只有个六七十岁的老祖母，光靠她卖香烟过活。她穷得可怜，吃不饱，常去菜市捡菜叶填肚子。刚才她大概饿得受不住，顺手拿了爷叔一块蛋糕……租界上就是这样的，咳，菜来啦！”

季交恕见他说到什么爷叔就不敢说，又问：“爷叔是谁？怎么这样凶？”余寿松在旁边插嘴道：

“喂，老朋友，不要挖树搬根。”一把拉着季交恕，往椅子上一按：“来，吃！”那个茶房一边裂开嘴笑，一边点头，车转身子出去了。

“他怎么吞吞吐吐不敢说？”季交恕问。

“哼！爷叔就是流氓头。在上海这个流氓世界，谁敢得罪他们？”余寿松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你还不知道，从民国以来，因为连年混战，兵灾匪祸，各省逃来租界当寓公的富户、军阀、政客、流氓、土匪……各色人等，就像茅坑里的蛆虫一样多。这些人有所欲为，打个把女孩子算什么！”陈霖也像是同情那女孩的样子，问：“如此野蛮，外国人不不管么？”

“嘿，他们管？”余寿松气愤愤地说了一大串：“洋大人动不动就打人，打死人只当打死一条狗。贩烟、绑票、盗窃、抢劫等坏事多得很哩！还有从未听过的什么‘曲线模特儿’、‘裸体舞’、‘活春宫’，都是外国巡捕房包庇纵容搞的。他们总爱吹‘西方文明’，哼，什么文明！”

坐在旁边半晌不说话的汤谟，很不以为然，强颜作笑道：“嘿，

那还不是坏在中国人！”

季交恕一听到汤谟这么说，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因见汤谟一向崇拜外国人，在东京时候，经常说只有外国文明，曾经为此跟他驳过嘴；现在汤谟又说中国人坏，就觉得非骂他几句不可。于是把手里燃烧着的半截香烟往地下一扔，睁大眼睛，望着汤谟道：“难道中国人都是坏蛋吗？你是哪里人？”

陈霖也一向不大高兴汤谟，因为汤谟自恃日语英语讲得好，喜欢拍外国人的马屁，洋奴作风重。可是陈霖的脾气，比季交恕温和些，不大爱讲直话，只是微微地笑一笑道：“汤谟兄！你我都是中国人啦。”

汤谟的瓜子脸上，突然红了一大片，嘴唇皮正在颤动，像是想开口。余寿松连忙站起来，一手拉着他们：

“算了，算了！逛大世界去！晚上请你们看戏。”就这样把他们的话岔开了。

大世界是一幢很高的洋楼。他们这四位当中，只有汤谟西装笔挺，金手表，金丝眼镜，显得很阔绰。从马车上一同跳下来，余寿松走在前头，汤谟走第二。刚刚踏进大世界，乱哄哄的一大群，把走在后面的季交恕和陈霖挤开了。余寿松回转身来打招呼，不知怎的，戴在他头上的一顶硬壳呢帽，被背后的一个人一手抓去跑了。

“哦！捉扒手！”余寿松大叫一声。可是人山人海，哪里找得着？他骂道：“妈的！鬼大世界！”满脸通红。因为这呢帽是西洋货，要值好几块钱，他心里实在有些难过。可是汤谟的气概就不同，走近前去笑一声：

“一顶帽子小事，算了吧，只怪你自己不小心。我从来没有丢过东西。”

从第一层、第二层逛到最后那一层，这是有茶楼、茶馆、戏园等设备的屋顶花园。兜一个圈子之后，他们四位同在一处卖茶的地

方坐下来了。这地方的四壁，都装着半截玻璃窗，内中还有几个小小的房间，摆着很精致的桌椅。季交恕正端起一杯茶往嘴里送，忽然呀的一声：“呀！交恕！”从敞开了的玻璃窗门外，传过来这么一句叫他的声音。

“谁叫你？”余寿松望着季交恕。因为他看清了也听清了玻璃窗外喊季交恕的两位穿西装的都是湖北口音。

季交恕站起来，走至窗门口，伸出半个头：“哦！你们啦！久违，久违。”立即跑过去，一手拉着詹大悲，一手拉着潘怡如，略叙几句寒暄。本想多谈一下，因见这里耳目众多，有所不便，就彼此写下各人的住址，约定后天礼拜二再见，匆匆告别了。

“那两位是谁？”余寿松他们同声问。

“我的老朋友。”季交恕没有说出姓甚名谁，因为知道他们曾经到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最近回到上海做秘密活动。

光线渐渐暗下来了，电灯一开，亮同白昼。站在这高楼上放眼望去，无数的灯光，好像把整个租界，沉浸在布满明珠的大海中，显得格外辉煌。

“真好看，上海租界比东京还漂亮些。”汤谟很羡慕似的：“寿松！你在这里搞，真好。等于住天堂。”

“好是好，可惜不是我们自己的天堂。”余寿松这么答复他。季交恕和陈霖依然四顾没作声。

“走，看戏去！”余寿松说一声，就领先下楼，汤谟仍然走在第二。此时，大世界门前的往来行人，比下午更多些。他们四位，正在上马车，不知怎的，一个穿着相当漂亮的年轻人，朝着汤谟喊一句：“久违。”汤谟一怔，记不得是谁。刚一欠欠身子，问他贵姓，那人就一拱手，伸出三个指头，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手把汤谟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攫去，交给另一个，往人群里一钻，不知去向。

“哦？喝！”汤谟叫一声，坐在马车上大发脾气：“上海地方真坏